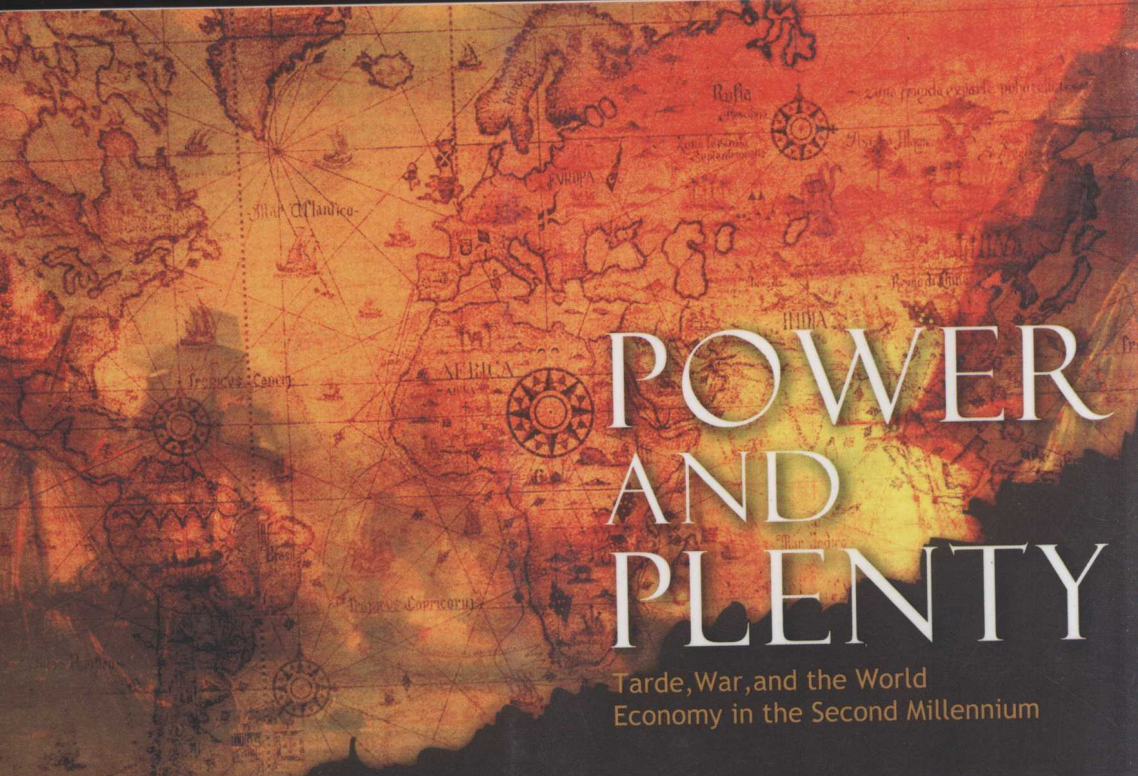




POWER AND PLENTY

Tar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强权与富足

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

罗纳德·芬德利 (Ronald Findlay)

凯文·奥罗克 (Kevin H. O'Rourke)

华建光

著
译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POWER AND PLENTY

Tar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强权与富足

罗纳德·芬德利 (Ronald Findlay)

凯文·奥罗克 (Kevin H. O'Rourke)

华建光

著
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强权与富足 / (美) 芬德利, (美) 奥罗克著; 华建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6
书名原文: Power and Plenty: Tra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ISBN 978-7-5086-2519-5

I. 强… II. ①芬… ②奥… ③华… III. 国际贸易—经济史—世界 IV. F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0292 号

Power and Plenty by Ronald Findlay and Kevin H. O'Rourke

Copyright © 2007 by Ronald Findlay and Kevin H. O'Rourke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f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强权与富足

QIANGQUAN YU FUZU

著 者: 罗纳德·芬德利 凯文·奥罗克

译 者: 华建光 译 范世涛 校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8 字 数: 65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3563

书 号: ISBN 978-7-5086-2519-5/F·218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要想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世界，就必须了解它产生的那段历史。当今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并非凭空而生；而是肇始于历时近千年且曲折动荡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而这一进程主要受制于世界各区域之间交往方式的不断变化，除了贸易、移民和投资外，还有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本书的主旨就是要诠释过去一千年来世界各区域的贸易模式及其演进、全球范围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众多有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历史著作相比，本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破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方法，以世界七大区域为单元，概述它们在过去1000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域际贸易流动及各区域内的大国兴衰。二是突出军事力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强权和国家富足都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三是强调地缘政治既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因，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结果。

本书还利用当代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大量经验证据，系统分析了重大历史事件，如黑死病、蒙古大征服、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对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分析了贸易、殖民地在西方世界的崛起及其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是一部跨越千年的经济史巨著，透过时光之门，探寻世界经济体系与大国兴衰的历史印迹。史料丰富、视角独特、观点独到、历史感厚重、现实感强烈，是当前危机时期反思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预判未来政治经济走势的难得佳作。

献给简和罗珊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经历了很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是，随着工作的持续，我们所欠的人情也在不断增加，结果致谢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我们从2000年开始合作研究世界贸易史，这是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史学视角下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会议准备的论文。该会议于2001年5月在加州圣芭芭拉召开，结果产生了我们两人早期合写的一部专著（Findlay 和 O'Rourke, 2003）。我们衷心感激该会议的组织者 Michael Bordo、Alan Taylor 和 Jeffrey Williamson，同时也感谢国民经济研究局，正是她推动我们两人踏上了这七年的合作之旅。

在这七年里，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们。他们或者向我们提出了有益的问题，或者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数据，或者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这一过程再次让我们深切地感到，能在如此精彩的领域工作，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呀！帮助和鼓励过我们的人有：Olivier Accominotti、Lee Alston、Remo Becci、Steve Broadberry、Andre Burgstaller、Bruce Campbell、Rich Clarida、Greg Clark、Bill Collins、Brendan Conroy、Max Corden、Eric Delépine、Brendan Dempsey、Javier Cuenca Esteban、Guillaume Daudin、Mike Edelstein、Barry Eichengreen、David Eltis、Antoni Estevadeordal、Bouta Etemad、Zoé Fachan、Rob Feenstra、Niall Ferguson、Michael Finger、Marc Flandreau、Dennis Flynn、Oded Galor、Mike Gibney、Arturo Giráldez、Barry Goodwin、Ann Harrison、Marc Harrison、Tim Hatton、Masahiro Hayafuji、Bob Holton、John Hegarty、David Hummels、Joe Inikori、Dominick Jenkins、Ron Jones、Koichi Kimura、Herb Klein、

致谢

Jan Tore Klovland、Deepak Lal、Philip Lane、A. J. H. Latham、Jim Livesey、Mats Lundahl、Angus Maddison、Connie Malone、Jacques Mollard、Bob Mundell、Antoin Murphy、Patrick O'Brien、Lawrence Officer、Cormac ó Gráda、Marcelo Olarreaga、William O'Neill、Bernhardine E. Pejovic、David Richardson、Jim Robinson、Lennart Schön、Barbara Solow、Robert Solow、Yuji Tamura、Peter Temin、John TePaske、Joachim Voth、Jan de Vries、Stan Wellisz 和 Martin Wolf。我们诚挚地感谢所有这些人，同时也感谢国民经济研究局上述会议的参与者以及我们在致谢名单中不小心漏掉的每一位同事。本书的许多章节都大量援引了我们与其他同事的研究成果，尤其要提到的是 Mats Lundahl 和 Jeff Williamson；感谢他们允许我们援引其研究成果。

我们要感谢 Bob Allen、Rosemary Byrne、Francois Crouzet、Stan Engerman、Sevket Pamuk、Alan Taylor 和 Jeff Williamson。他们拨冗阅读了本书原稿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Nick Crafts、Doug Irwin 和 Eric Jones，他们通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对此给出的反馈意见使本书有了相当大的改进。我们衷心感谢 Regina Grafe 和 Joel Mokyr 睿智而又深刻的评论，他们促使本书的论断紧扣重大的历史阶段。Vanessa Schaefer 则是本书早期的校对者之一，他不仅细心校对，还对本书的早期手稿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改意见。下面这份特别的谢意要送给 Andrew O'Rourke，他所通读的那稿内容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最后一稿，其敏锐的视角着实使本书增色不少。

许多研究助理对我们的工作也作出了贡献，我们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他们分别是：Silvi Berger、Mark Clements、Maria Coelho、William Hynes、Paula Labrecciosa、Patrick Leahy、Sibylle Lehmann、Ronan Lyons、Matthew Pham、Alan Reilly 和 Theodore Talbot。

本书作者之一的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开始撰写此书时，还管理着爱尔兰的资深研究员队伍；他十分感谢爱尔兰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Ir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慷慨资助。更进一步的资助则来自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

国际一体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 以及欧盟科研培训网络计划 (Research Training Networks Program, 合同号为 MRTN - CT - 2004 - 512439 和 HPRN - CT2002 - 00236), 对此, 我们也要致以谢意。上述三个组织使我们得以在本书写作的关键阶段 (2006 年春天在都柏林的那段时光) 仍能通力合作。奥罗克要感谢 Alan Matthews, 正是他多给了一年停薪假期, 使之可以继续从容写作本书; 而 Marc Flandreau、巴黎政治学院和 Mike Bordo 所提供的资助, 则使这一无薪假期又有了财政来源。奥罗克还要感谢 Villard 和 Entremonts Valley 两个度假村的人们, 是他们为他写作本书提供了一个十分宜人的环境。

下面, 我们要对本书地图的制作者 Maura Pringle 表达特别的感激之情。面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纯理论的犹疑时, 她显示出了高超的业务技能和非同寻常的耐心, 为本书的改进作出了相当有价值的贡献。“谢屋及乌”, 我们当然也要多谢 Bruce Campbell 和 Gill Alexander, 正是他们将这位如此出色的专业人士引介给我们。她秉持制图者的严谨作风, 精确绘制了每一政权或帝国的辖域和分界线, 以及每一古址的确切地理位置。这推动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文献来源, 以期获得更加合理的解答。除了本书正文中所提及的许多历史专著, 我们也从以下著作获益匪浅: McEvedy (1961)、Schmidt (1999), 以及菲利普 (Philip) 的权威性巨作——《世界历史地图集》(Atlas of World History) (O'Brien, 2002), 该书曾以“牛津世界历史地图集”(Oxford Atlas of World History) 为名出版。我们也十分感谢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早期印刷书籍保管员 Charles Benson, 是他帮我们找到从迈克尔·德雷顿^① (Michael Drayton) 诗篇的《多福之国》(Poly-Olbion) 中找到了我们所需的那一卷首页。我们也感谢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委员会授予我们重新印刷该页的权利。

Jon Wainwright 是 T&T 印刷厂的一位杰出技术编辑和排版专家, 他一丝不苟地审阅了各个细节, 同时还“神来几笔”, 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我

① Michael Drayton, 1563 ~ 1631 年, 英国诗人。——译注

们很享受跟他共事的这段时光。此外，我们跟 James Lamb 的合作也很愉快，他不仅娴熟地编制了本书的索引，跟 Jon 一样，帮我们改正了行文中的许多错误。在这一研究中，我们跟 Richard Baggaley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Emma Green 和 Carolyn Hollis 的合作也充满着愉悦。Richard 是一位极其宽容大方的编辑。我们感谢他对我们的忍让和鼓励；同时也要向他致以诚挚的歉意，因为我们的许多举动曾百般挑战他的耐心。具体到我们那些有耐心的同事，我们要向那些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有合作的各位作者致以歉意。由于撰写本书，他们不得不退居一旁，耐心等待；这段漫长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等了一辈子。我们虽然没有提及这些合作者的具体名字，但是他们知道我们说的是谁。他们同样值得我们感谢。

最后，我们要把我们最重要的谢辞送给我们各自的妻子——简和罗珊。在撰写本书期间，她们不得不与那位占有欲极强而又非常难缠的“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这位情妇毫无忸怩之感，在最后的四年里变得愈发依恋我们两位作者，结果拒绝割断情丝离我们而去。我们明白，最终摆脱这位情妇所获得的轻松感，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默默爱恋。因此，我们要将本书献给她们俩，虽然这根本不足以表达我们对她们俩的所有感激和爱意。

两位作者写于纽约和圣皮埃尔

撰写本书是基于以下信念：如果你想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世界，就必须了解它产生的那段历史。当代的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肇始于一个世界范围内曲折的经济发展进程。该进程虽不说有千年之久，至少也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反过来看，该进程的形成主要受制于各大世界区域之间交往方式的不断变化——除了贸易、移民和投资外，还有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本书的主旨就是要理解以下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和交互影响：一方是区域之间的贸易模式及其演进；另一方则是全球范围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

和许多专著一样，本书的撰写，其主要受益者也是作者本人。当下，有关具体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史专著数不胜数，而有关世界史乃至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文献也在迅速增加，专业性更强的国际贸易史专著同样汗牛充栋。这些书的作者，一般都只关注某些特定的区域或时代。因此，在为有关较长跨度世界贸易史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论文准备相关材料时，我们两位作者都发现：从经济学家视角针对该主题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在以上所说的各色专著中却找不到答案。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自己倒是熟悉了大量较为专业的研究文献（毫无疑问，我们的熟悉程度还很不够）；很多时候，为了找到与研究目标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我们发现自己需要对同样的资料来源加以重新深挖细耕，这就犹如在几经筛选的沙地中寻觅遗漏的金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撰写一部著作，以尽可能全面而又整体地概述第二个千年的世界贸易史。

具体来说，即使考察诸如香料贸易这种相当具体而又常见的课题，我们也发现在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中找不到详细叙述它的可靠通史。造成这

一现状的原因相当明显。这些香料产自印度尼西亚群岛，有两条主要的海上运输路线。第一条路线是经由波斯人、阿拉伯人、古吉拉特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其他各色商人之手，转运到红海或波斯湾。第二条路线则是绕过好望角，被阿拔斯王朝、马木留克王朝、萨法维王朝以及其他中东政权课以关税之后，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分销到更远的西方和北方，最后被远在英国或法国的人群所购买。相应的，白银则通常会沿着与该香料运输相反的路线先回流到摩鹿加群岛，然后再抵达印度尼西亚群岛，从而完成整个贸易循环。上述两条路线只考虑了香料流向欧洲的情况，可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流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香料贸易其实更为重要。显然，面对时间绵延如此之长、空间跨度如此之广的香料贸易，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全面掌握与此贸易相关的所有必备知识和技能，即使渊博如费尔南·布罗代尔^①，也只能望洋兴叹。而上述香料贸易只不过是这本世界贸易史所涵盖的诸多话题之一。因此，撰写本书，首先需要挣脱短期的断代分析和局部的区域分析这两种狭隘研究的束缚，这无疑是一次冒险之旅。

最近，也有其他一些世界经济史专著问世。可仔细阅读之后，我们发现其中还是找不到我们所要寻找的信息和答案。龙多·卡梅隆的《世界经济简明史：自旧石器时代至今》（Rondo Cameron, 1989）涵盖的时间跨度比我们的一千年还要长。不过，不管是他还是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 Clark, 2007a），都没有聚焦于各个世界区域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交往，而这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著作《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Janet Abu-Lughod, 1989）虽然和我们一样，关注的也是世界经济各构成单位之间的互动，但其时间跨度实际上只有一个世纪，尽管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百年，即“蒙古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兰德斯（David Landes, 1998）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告诉我们，他的研究目标是“回溯并理解经济进程和现代化的主旋律”，但他将主旋律紧

^① Fernand Braudel, 1902~1986年，法国年鉴史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译注

紧限定在欧洲。当然，经济增长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更强调贸易模式和贸易格局、与时俱进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在过去一千年里世界中心和世界领导者的更替。

恰恰如其标题所昭示的那样，埃里克·琼斯激动人心的专著《欧洲奇迹》（Eric Jones, 2003）也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他大致从航海大发现开始自己的叙述，用于比较的单位则是由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体系，以及由伊斯兰奥斯曼政权、蒙古政权和满清王朝组成的非欧洲各帝国。欧洲的崛起是该书的主旋律之一，也是作者本人的主要观点之一。与此相比，一方面，我们所关注的时间跨度要更长一些；另一方面，我们用于描述的单位是在第一章里所界定的七大世界区域，而非琼斯所考察的欧洲诸国和三个亚洲帝国。琼斯本人已经成了他称为中国中心主义的加州学派历史学家的众矢之的，其中对他批评最严厉的要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2000）和王国斌（R. Bin Wong, 1997），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98）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能避免这种由立场偏好带来的腹背受敌的窘境。如同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将自己绑在船桅上逃过一劫，我们在叙述七大区域以及其余地区（这些地区的重要性虽不能与七大区域等量齐观，但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时，也力求避开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这两个惑人心智的海妖^①，保持中立，防止陷入欧洲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

因此，我们需要自己动手，费劲地把有关这一千年贸易历史的文献缝合在一起，这些文献几乎都是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相关的论述也不充分。当然，在每一个与贸易相关的更为具体的专业领域内，都有许多知识和技能远比我们专业的专家；不过，对于那些跟我们一样只是想大致了解这一千年世界贸易史概况的学者，我们希望本书的写作至少能减少他们翻阅海量文献的劳顿之苦。进一步来看，介绍世界贸易史也只是我们这本书所担负的其中一

^① Scylla 和 Charybdis 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分别驻守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两侧；因此航海者经过此地时或者是走潜藏暗礁的 Scylla 这侧，或者是走旋涡涌动的 Charybdis 那侧，后来英语用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这一短语来比喻进退两难的境地。——译注

个任务。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一以贯之地强调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对贸易的作用，这点可能会让某些经济学家觉得有些怪异或惊奇，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却全然是种司空见惯的做法。当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次着手研究国际贸易时，教授会要求他们深入考察 A 和 B 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禀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同时还拥有将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品的既定技术以及对这些商品的一系列偏好。接着，这两个国家是否进行贸易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贸易所带来的结果则同样导源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将时间因素引入该理论（事实上该理论经常无视时间因素），那么贸易单位就会按如下典型的形式演进：各国都在逐渐积累资本，培育新的工人，或者理性而自由的个人自愿决策下会导致更好的教育。在诸如此类的模型中，最让人感到不快的就是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政策工具，它们使部分个体或群体（有时可能是部分国家）受益的同时，却牺牲了本国其余居民或外国居民的利益。

真希望现实就是这般简单而又纯粹。可我们在下文中将会指出，世界贸易最大的几次扩展并不是源自学者们虚构出来的瓦尔拉斯拍卖商^①那种兵不血刃的反复试错，而是源自马克沁机枪的枪管、半月弯刀的刀口或游牧骑兵的暴行。当贸易需要更多工人时，工人的数量和质量一般都无需考虑和深思，因为工人的补充完全可以通过强行使之沦为奴隶而实现；同样，当贸易需要更多利润时，完全可以通过肆意掠夺和强加垄断来实现。在很多时候，贸易模式只能理解为相互竞争的政权之间某些军事和政治均衡的结果。对我们来说，贸易对战争与和平的依赖十分明显，这从本书的书名“强权与富足”中就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政治决定贸易；不过，贸易通过影响各政权的能力和激励，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强权”和“富足”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将是本书的一个核心特征，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948）早就提出了这一关

^① Walrasian auctioneer，指一个假想中的拍卖喊价人，以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法国经济学瓦尔拉斯的名字命名。——译注

系。“强权和富足”这一短语，直接取自迈克尔·德雷顿^①的《多福之国》篇首的几行——该长诗首次出版于1612年。这几行印在卷首页的诗句是整首诗的重要注释，我们也将之重新印在了本书的卷首页上。科比特和莱特鲍恩（Corbett 和 Lighbown，1979，第156页）评论此诗时说道：阿尔比恩（英格兰的旧称）或不列颠此时显得“繁荣昌盛、喜气冲天，而且在其整个漫长的历史中，也只有此时才显得那么年轻美丽”。她戴着珍珠饰品，傲立在岛内的据点上，手里拿着丰饶角和权杖，安详地体会着自己享有富足和行使强权的美好感觉。

可是没过多久，这一美少女般的温柔形象就迅速蜕变为主动的铁血统治者，她不仅是英吉利海峡的统治者，也是全世界各大海洋的统治者。显然，任何一段国际贸易史都不可以忽视这类军事行动的原因和影响。当经济学家采取传统做法，强调和平的自愿交换的好处时，我们不应该遗忘：动用武力必然涉及稀缺资源的分配，也会给动用武力的人、遭到武力攻击的人以及第三方带来成本和收益。因此，和其他活动一样，动用武力也适用经济分析，即莱昂内尔·罗宾斯^②给出的著名定义：“对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上述这些论断也许不适用于过去的两个世纪，因为工业革命对之后的整个经济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跟随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性突破而来的19世纪的全球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而其最独特之处很可能就是基本立足于技术革新和应用（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强权政策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新技术使强权政策的推行变得更加容易）。新技术不仅使各个市场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而且还在各区域之间划开了一道巨大且至今仍然存在的收入鸿沟，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劳动分工：从事制造业的中心区域和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区域。从那时开始，就出现了如下重大问题：发展中国

① Michael Drayton (1563 ~ 1631 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诗人。——译注

② Lionel Robbins, 1898 ~ 1984，著有《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发展理论》等。这里所提到的定义即出自其《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译注

家怎样才能赶上中心国家？他们应该像 19 世纪所成功尝试的那样，利用其自然资源优势实现追赶吗？而这是否会使他们极易受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的影响，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时期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是否应该像 1945 年之后很多国家那样，干脆退出国际市场，抑或像过去 20 年里很多国家那样，再次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些问题以及诸如西方应该如何坦然面对印度和中国崛起之类的相关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不对称分工格局。因此，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当下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历史问题。

反过来看，工业革命本身也只是漫长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果，引发工业革命的种种因素可以比较清晰地回溯到中世纪，在那时，商品、武士、细菌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发挥着领军作用。因此，纯然从内因角度来阐述“西方的崛起”必然是不充分的，这种只强调西方制度优越性、文化特质或先天禀赋的解释路线显然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死路，因为该解释完全忽略了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更为广阔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过去的很多世纪里一直发挥着作用，而且对跃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性突破有着重要作用。当然，我们绝非从国际角度审视西方崛起的第一人；不过，提出这一角度的史学家一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不是。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一样，我们将创新和激励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非单纯的原始积累或与之类似的东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欧洲的海上扩展和经济增长毫不相关。掠夺虽然可能没有直接推动工业革命，但是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全球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促成了市场的扩展，确保了原材料的供给。由此看来，暴力无疑会极大地影响供给和需求这类传统经济力量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

通过这种研究，今天许多重大的区域间紧张关系都可以回溯至更早时期世界各主要区域之间的交往。为了寻求对这一历史的理解，经济学家需要严肃思考经常被他们忽视的因素——地理。我们所谓的“地理”，并非高度程式化的经济地理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事先很难区分开来的世界各区域对称地处在没有任何特色可言的平面、直线、球体或六边形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事后才变得有所区别，其间小概率随机事件的影响被不断放大，并通过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而永久化。当我们说“地理”时，我们指的就是地理本

身，如山峦、河流等一切地貌特点。假若成吉思汗诞生于新西兰，他绝不可能名留青史。爱尔兰人肯定想通过控制东南亚香料的供应来胁迫欧洲其他地区，以牟取暴利，但是“地理”没有把这一机会给他们，而是给了埃及的统治者。如果有位欧洲人想寻找通往印度的直达通道，他当然可能选择一直向西前进，然后偶然邂逅了美洲；而对于中国航海者来说，没有人会愚蠢到向东寻找前往阿拉伯的通路。因此，通过考虑各区域地理分布的先天差异，世界史的许多可能结果可以被事先排除，而不用非得等到事后。

在我们的阐述中，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中的三件历史性世界大事分别是：14 世纪的黑死病以及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15 世纪和 16 世纪之交新大陆的发现及其与旧大陆一体化进程，18 世纪和 19 世纪之交的工业革命。我们希望通过此书来确证，上述三大转折性事件中，没有哪一个是某一区域独立作用的结果；更不用说三大事件均是某一区域独立作用的结果。导致第一个事件的是蒙古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该局面的缔造者虽然是中亚的游牧民族，但其他六大区域也都参与并巩固了这一格局。欧亚大陆中首批航海到达新大陆的确实是西欧人，但是许多出口到旧大陆的新大陆商品的生产者是非洲人，虽然这跟他们本身的意愿相左。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更具体说是在英国，但其主导产业部门所必需的基本原材料由迁往美洲的非洲人所生产，而最终成品则销往世界各地的所有市场。当下，世界经济仍在继续演进：西欧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海外领地或据点无疑正在缩减和消失当中；与此同时，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则均以较快速度发展壮大，终结了之前已延续好几个世纪的相对停滞状态。

在读者们潜心阅读这段长达千年的历史之前，我们理应先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在第一章中，我们首先探讨了一些方法论问题，并将第二个千年的欧亚大陆和地中海以南沿海地区勾勒为以下七大世界区域：西欧、东欧、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由于这七大区域的界定除了根据地理方面的特点外，还考虑了文化史和政治史，所以我们也简要解释了每个区域的决定性特征。因此，我们划定东西欧分界线的主要依据，是宗教信仰，而不是某些地理特征：西欧信奉罗马天主教，东欧则信奉东正教。

按照我们的区域划分，君士坦丁堡沦落到奥斯曼帝国手中，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剩余部分转到了伊斯兰世界。不过，具体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世界，我们还是根据地理特征将该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及附近信奉佛教的地区归入同一个世界区域——东南亚，没有因为这些地区皈依伊斯兰教，而将之纳入伊斯兰世界；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地区与附近其他地区的相同点仍多于它们和伊斯兰世界的埃及人或叙利亚人的相同点。

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了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上述七大区域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之间的贸易关系及其他往来活动。在这一时期，与其他区域仍持续保持着直接联系的只有伊斯兰世界这一个区域。对此，读者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此时的伊斯兰世界在阿拔斯、法蒂玛和倭马亚三大哈里发政权的统治下，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三个王国分别定都在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相比之下，该时期与其他区域接触最少的是西欧。第三章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和考察了1000~1500年之间的世界经济演进过程。在该章中，我们关注的重大事件如下：（1）蒙古强权下的和平格局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紧紧地连成了一个受蒙古帝国庇护的统一整体，并刺激了由大西洋至日本海的长途贸易；（2）黑死病的毁灭性影响，蒙古大征服运动造就的“病菌共同市场”打开了黑死病这个潘多拉之盒；（3）黑死病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产出提高和物价上涨，尤其是在西欧和东南亚。

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历史进程为伊比利亚人的“壮举”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公元1500~1650年间，他们进行了航海大发现，并由此揭开了征服、掠夺和开发新大陆、非洲及亚洲的序幕。这些在第四章都有具体的叙述和讨论。哥伦布大发现最重大的影响就是16世纪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白银贸易。对此，第四章有较大篇幅的阐述。在接下来的第五章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重商主义时代里，荷兰共和国、英国和法国为争夺新兴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展开的长期斗争；接着关注的是，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的陆路扩张，这些扩张的方向跟上述列强的海上扩张相反，是由东向西，起点是中亚、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该章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亚洲人不只是被动的参